

多重哲學典範：彈性運用還是發展過程？

李維倫

摘 要

本文對於黃光國教授所主張之「多重哲學典範」心理學研究策略提出疑問：「多重哲學典範」之主張，到底有沒有可能是依問題性質而採不同方法典範的實用主義彈性運用，還是根植於本土心理學發展道路中的進程現象，如從後實證主義、建構實在論、到詮釋學的進程？本文認為，不同科學哲學典範有不同的本體論，因此研究者很難在不同典範間遊走而不感到自相矛盾。如果研究者在經驗「多重哲學典範」時不是，也無法採行彈性運用的方式，那麼我認為，這種種的典範之於本土心理學研究者，有可能是經過深入探討深思熟慮之後的選擇或轉移選擇的經驗。

關鍵詞：多重研究典範策略、實在論、後實證主義、建構實在論、詮釋學

李維倫 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通訊作者：wllee@mail.ndhu.edu.tw）

二十餘年來黃光國教授為推動心理學本土化的重要旗手。今在《輔導與諮商學報》之「靶子論壇」率先為文，呈現其在本土化志業上的學思進展，並以「凡我同志，盍興乎來！」召號學界同仁投入建立具文化主體性的學術事業。我相當認同黃教授的呼籲，一直以來也將自己定位在本土臨床心理學的發展道路上。這次很榮幸得以在這裡與黃教授論談。底下我將先呈現我對黃教授文章的理解，再提出我的淺見，就教於黃教授及各方先進。

黃光國教授這篇以「『靶子論壇』、辯證詮釋與『互為主體』」為題的文章，以三個「論辯事件」呈現了他二十多年的學思發展。第一個論辯事件是1993年12月出版的《本土心理學研究》第二期之「靶子論壇」，其中刊登了黃教授的靶子論文與蘇國勛、葉啟政、林正弘及顧忠華等四位學者的回應。這次論辯對黃教授學思的影響是讓其深入科學哲學領域，確立以「多重哲學典範」做為本土心理學發展的知識論路徑，並以建立「涵攝文化的心理學」為結果。第二個論辯事件是關於泛文化向度與文化系統的研究取向之辨/辯。在其中黃教授力主過去西方學者所持之泛文化向度典範來研究本土心理學之不當，而獲得學者如 Michael Bond 之認同且轉向支持文化系統的研究典範，這可謂是一件本土心理學在國際學界取得主體地位的指標事件。而第三個論辯事件則是黃教授與瑞典學者 Carl Martin Allwood 關於心理學研究中如何處理「文化」的學術論辯。黃教授以海德格及高達美的詮釋現象學思考來呈現給讀者此次論辯的意涵，即在於一種互為主體性的視域融合。在此我讀到的意涵是，對於黃教授個人或是本土心理學的發展來說，學思與學理的發展不是要人云亦云，也不是要進入獨我的狀態。從本體論的層次來看人類的相互理解實是奠基於互為主體性。在其中所成就的本土心理學的知識論主體乃是一動態的主體性，是知識論上的互為主體性。

我也發覺，黃光國教授以「論辯事件」來呈現他的本土心理學學思發展也意指著：一個

學術思潮或典範的開展不是依靠觀察自然的實徵研究而是在知識論與方法論層次上的論辯。台灣的科學教育一直以來都是毫無反省地傳誦著已經過時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使得進入心理學的學生乃至學者以為靠著實徵研究就可以累積或抵達真理。而今推翻實證主義真理觀之邏輯實證論(logic empiricism)所成就的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也已逐漸退場。以維也納大學為中心，新興起的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e realism)拾回邏輯實證論所拋棄的實在論問題，除了科學理論建構的微世界(realität, microworlds)外，更強調既予的世界(wirklichkeit, The given world)與生活世界(lebenswelt, lifeworld)在科學活動中的根本地位，並以具實用主義(pragmatism)色彩的外推(strangification)策略來說明科學理論的意義其實來自生活世界的行動(沈清松, 1997; Wallner, 2006)。雖然科學活動並不是由科學哲學來指導，但後者卻是對前者的觀察並嚐試提出前者之錯誤或問題的解決之道。因此對科學哲學及其典範更迭的理解，將提供給科學家對科學活動之侷限性的認識，並可藉之思考更適切的未來可能做法。這一點其實黃光國教授知之甚詳，也是他一向的主張。我只是在此藉黃教授的行文方式再次提醒讀者，投入本土心理學運動，必然要反思與論辯心理學科學活動的本質與實踐方向，而黃教授的耕耘已為心理學界開起了一扇通往知識論思考的大門。

由於同樣關注於心理學方法論與知識論的議題，我對於黃光國教授所主張之「多重哲學典範」產生了疑問：「多重哲學典範」之主張，到底有沒有可能是「針對不同性質的問題，採用最適恰的科學哲學」的彈性運用，還是根植於本土心理學發展反思道路中進程現象，如從後實證主義、建構實在論、到詮釋學的進程？對我來說，由於不同科學哲學典範有不同的本體論，即對實在的看法各個不同，因此研究者很難在不同典範間遊走而不感到自相矛盾，所謂的彈性運用也就會常常使得研究者在同一個研究中出現在知識論上不相容的論述。底下進

一步說明這個問題。

不同性質的問題採不同方法典範處理，是一種實用主義式的彈性運用原則，過去楊國樞教授也曾主張本土心理學發展應採用研究典範多元發展，因為各個典範有各自擅長的問題場域，不過研究者本身也可能選擇典範轉換(楊國樞，2005)。因為不同問題或問題場域而採用不同典範進行研究，看來是一個相當務實的做法；黃光國教授的主張似乎是此一路線上的思考。不過不同的研究典範奠基於不同的本體論思考，即對「實在」(reality)有不同的預設，並據以定義研究者跟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因此研究典範是研究者站立於其上的地基而不是口袋裡的工具。進一步來說，實證主義的素樸實在論(naïve realism)理所當然地認定「外在世界獨立於人的意識之外」；認為人類感官經驗所得的即為實在。如人類看到太陽每天東昇西落，就認為人類居處的大地是宇宙的中心，太陽與其他星辰是圍繞著人類大地而轉動。後實證主義的實在論(post-positivist realism)標舉了這樣的觀點：「實在」存在於人之外且是人類所有認識可能性的來源，但實在本身不是人類認識可以完全通達的；人類經驗到的只是繁雜的現象。根據這樣的觀點，科學的目的即是在從繁雜的現象中篩出規律，建構理論，以理論來逼近實在。當現象的呈現越來越多，人們的觀察越來越廣，就會對既有理論進行一次一次的更新，那麼理論與實在之間的距離就逐漸縮短，即便這樣的工作永遠無法徹底完成。這裡就顯現出來，實證主義的知識目標是去獲得對實在的描述(極致的形式是以數學模型來描述)，所得到的知識被視為真理(truth)。而後實證主義的知識目標則在於每一次研究活動中提出對於實在的假設(hypothesis)，經過程序方法的驗證(verifying; testing)，獲得了暫時成立的理論(theory)。

再者，建構實在論視實在為既予的世界，而如同後實證主義主張的一樣，人類永遠無法掌握。科學理論是人類的建構(constructs)，雖可處理來自既予世界的資料(data)而自成一科

學微世界，但並不能將之視為對實在的描述。只有當人於生活世界中，參考科學理論來處理既予世界所呈現的問題時，科學理論建構才獲得意義，才稱之為知識，而這樣過程是一種外推的活動(沈清松，1997；Wallner，2006)。此外，我曾論述源於海德格存在現象學(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之存在論(existentialism)觀點的實在論及其相映的科學活動，指出不可抵達的實在在做為「未知」，不但在實在論的觀點下可以合法地為人們所接受，也成為人類生活重要且不可忽視的特徵。據此，存在論的認識活動在於揭露以「未知」為根本的人類種種存在經驗。對後者來說，對現象的知覺是存在經驗的一部分，深究現象的同時也正是對人類存在的反身性理解(reflexive understanding)。如此，科學活動的探究是奠基於人的存在性，也是一種關於人存活於世的反身性(reflexivity)，認識到的是人與人、人與物、以及人與週遭世界的關聯狀態(李維倫，2015)。

由上可知，實證主義、後實證主義、建構實在論與存在論對於何謂實在以及何謂知識的理解各不相同。這裡的差別不是「視問題性質而定」的說法可以跨越得了的。

如果研究者在經驗「多重哲學典範」時不是，也無法採行彈性運用的方式，那麼我認為，這種種的典範之於本土心理學研究者，有可能是經過深入探討深思熟慮之後的選擇或轉移選擇(楊國樞，2005)的經驗。黃光國教授在此的靶子論文中提到的存在層次上的理解結構以及詮釋學的視域融合觀點似乎正是在說明這樣的轉移經驗歷程。因此這個問題的釐清除了有助於後學理解黃教授的學思，也將使得進入本土心理學道路的學生學者有更清楚的指引。

收稿日期：104.10.14

通過刊登日期：104.11.5

參考文獻

- 沈清松 (1997)。沈序—建構實在論評介。載於 Fritz Wallner 著，**建構實在論**。台北：五南。
- 李維倫 (2015)。從實證心理學到實踐心理學：**現象學心理學的知識之道**。第三屆現象學教育學國際會議。北京。
- 楊國樞 (2005)。本土化心理學的意義與發展。載於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 (主編)，**華**

- 人本土心理學** (頁 3-56)。台北：遠流。
- Wallner, F., & Jandl, M. (2006). The importance of Constructive Realism for the Indigenous Psychologies approach. In U. Kim, K. S. Yang, and K. K. Hwang (eds.), *Indigenous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Understanding People in Context*. (pp. 49-72). New York: Springer.

Multi-Paradigmatic Research Strategy: Pragmatic Flexibility or Developmental Necessity?

Lee, Wei-Lun

Abstract

To Professor Hwang's multi-paradigmatic strategy for indigenous psychology, I raise the question that: is this strategy a pragmatic flexibility for various research intents or a necessary sequence from post-positivism, constructive realism, to hermeneutic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indigenous psychology? Regarding that different epistemological paradigms hold different ontologies,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researchers to shift among different paradigms without being incoherent. If this is truly the case, then the various paradigms appearing in the field of indigenous psychology might indicate the researchers' thoughtful choices or conversional choices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indigenous psychology.

Keywords: multi-paradigmatic strategy, realism, post-positivism, constructive realism, hermeneutics

Lee, Wei-Lun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wllee@mail.ndhu.edu.tw)
--------------	--

